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

范 凡

摘 要 日本学者松见弘道致力于介绍、翻译和研究中国图书馆学四十余年,关于刘国钧和杜定友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堪称“北刘南杜”海外研究的集大成者。研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研读他们的著作,并翻译成日文出版;二、撰文介绍他们的学术业绩和人格,并致以较高的评价和敬意;三、他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是置于世界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视野之中的,史无前例地把他们与世界一流图书馆学专家相提并论;四、他在对刘、杜的研究过程中,与他们本人建立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互相寄赠彼此在研究中急需的专业书籍,反映了当时中日图书馆学交流概况。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彰显松见弘道的学术贡献,并为国内“北刘南杜”研究乃至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史研究提供借鉴。表1。参考文献22。

关键词 北刘南杜 刘国钧 杜定友 图书馆学史 中国 日本 松见弘道

分类号 G259

Hiromichi Matsumi's Research on LIU Guojun in Northern China and DU Dingyou in Southern China

FAN Fan

ABSTRACT

The paper is to study the achievement of the old generation of Chinese library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Mr. LIU Guojun in northern China and Mr. DU Dingyou in southern China (abbreviated to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discuss their influence in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y world, and ascertain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20s.

The author used to be a 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Keio University during September 1, 2013 to August 31, 2014, under the terms of the Exchange Program Agreement between Peking University and Keio University for the 2013-2014 academic year. The author read a lot of Japanese literature of library science in the Keio University Library and found that Mr. Hiromichi Matsumi's research on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is abundant. Hiromichi Matsumi translated two books written by LIU Guojun, and one paper written by DU Dingyou into Japanese; he had many correspondences with LIU Guojun and DU Dingyou, and wrote several papers on them. Besides this, some of his books and papers were introduced to China, or wer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which are also included into the coverage.

By interpreting Hiromichi Matsumi's books and papers, meanwhile referring to the related research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the paper makes clear the course of the written communication between Hiromichi Matsumi's and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of Hiromichi Matsumi's translation and study.

Hiromichi Matsumi devoted himself to introduce, translate and study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for more than forty years, which made him famous in China. His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 was the study on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which made him the excellent oversea expert in this field. His study includes four aspects. Firstly, Hiromichi Matsumi read their

通信作者: 范凡, Email: ffan@pku.edu.cn (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FAN Fan, Email: ffan@pku.edu.cn)

books and papers and translated them into Japanese, including one paper, *The Brief History of Book Classification*, written by DU Dingyou, and two books, *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and *The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written by LIU Guojun. Secondly, Hiromichi Matsumi wrote several papers to introduce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personality with high evaluation and respect. By the end of 1993, he had wrote four papers titled LIU Guojun and two papers titled DU Dingyou, and there were several other papers mentioning one or both of them. Thirdly, Hiromichi Matsumi studied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in the view of the international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so he was the first one who evaluated them as famous library scholars in the world. Fourthly, during his study, Hiromichi Matsumi kept in touch with LIU Guojun and DU Dingyou by mails, and they sent each other the books needed but hard to find in their own countries. Besides these, Hiromichi Matsumi was so familiar with the literature of library science both in China and Japan that his books and papers gave us a short cut to learn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20s.

The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origin and the real meaning of the phrase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and defines the specific meaning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t also collects and analyzes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 of Hiromichi Matsumi,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research on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even for the study on the communication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1 tab. 22 refs.

KEY WORDS

Northern LIU & Southern DU. LIU Guojun. DU Dingyou.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China. Japan. Hiromichi Matsumi.

1 关于松见弘道和“北刘南杜”

海外学者对于中国图书馆学的研究,因其文化背景、学术立场,甚至研究方法的不同,往往得出令人意想不到的学术见解,颇有借鉴价值,应当引起国内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重视。日本学者松见弘道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四十年如一日,热切关注并研究中国的图书馆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领域遍及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家、图书分类法和目录学等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图书馆界交流的促进与宣传贡献尤多。他对中国老一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和杜定友的学术成就的翻译和介绍尤为突出,对于两人毕生的学术贡献也做出了非常全面而客观的评价,堪称“北刘南杜”海外研究的第一人。

1.1 松见弘道简介

松见弘道于1918年6月8日生于日本滋贺

县虎姬町中野,1942年毕业于大谷大学文学部中国学科,1946年任大谷大学人文学第二研究室副手,1951年任岐阜大学司书长兼讲师,1963年任岐阜大学附属图书馆事务长,1978年任东海女子短期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长,曾于1970年获得国立大学图书馆协会岸本奖。松见弘道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学和图书馆学,尤其对中国图书馆学感兴趣。所参加的学术团体有日本图书馆协会、日本图书馆学会和日本图书馆研究会^[1]。他曾在一篇论文中称“恩师神田喜一郎”^[2],可见其师承。卒年未详^①,不知其所终,实在遗憾。

在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史上,松见弘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他于20世纪50—90年代的四十年间致力于向日本介绍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学界,把这项事业视作他“毕生学习的主题”^[3],为促进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做出了贡献,因此赢得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尊敬。他的一些论著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

① 张白影于1999年访日之际曾想拜会这位神交已久的老友,却被告知他已经去世。笔者据此查阅了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图书馆杂志》1994年以来日本图书馆界相关人事信息,均未发现其讣告或纪念文章。

影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由黄宗忠等人翻译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4]一书,此外还有多篇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如《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概况》^[5]、《评介台湾图书馆学、目录学论著索引》^[6]、《樱花更灿烂 相映杜鹃红》^[7]等。还有一篇关于杜定友的论文被翻译了两个版本,即《怀念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8]和《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9]。他曾两次访问中国,与一些知名图书馆学者建立了友谊,并被相关文献记录了下来,如《东邻新寄语 初识如故人》^[10]、《中日两国图书馆学交流之花》^[3]等。黄宗忠对他评价甚高:“他 40 年如一日,坚持研究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事业,发表了不少充满对中国、对中国文化热爱的论著。他不仅从资料中研究中国,而且多次到中国进行实地调查;他不仅翻译中国学者的著作,而且撰写了大量论著向日本读者宣传和介绍中国文化。我们对

1.2 关于“北刘南杜”

在中国图书馆界有“北刘南杜”和“北刘南杜中皮”的提法,但尚未有人精确考证这两种提法出现的确切时间和语境。笔者据相关资料和历史背景猜测,其出现可能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思,从正面来看,“北刘南杜”是指从 20 世纪 30、40 年代到 60、70 年代,身处北方的刘国钧和身

处南方的杜定友在学界的影响力;“北刘南杜中皮”是指刘国钧、杜定友、皮高品三人所编制的分类法在中国图书馆界具有三分天下的影响力。从反面来看,可能是作为批判对象的两种简称,因为这三位老先生在 1958 年先后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56 年级‘什么是图书馆学’批判小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1955 年级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小组”、“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三年级学术思想批判小组”以及“武大图书馆学系通讯小组”的批判,文革中尤甚。姑且不论“北刘南杜”这一提法的来历,仅从“把毕生都贡献给了中国图书馆事业”,而且“对中国图书馆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两条标准来衡量,刘国钧和杜定友并称“北刘南杜”都是当之无愧的。

2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概观

尽管“北刘南杜”在中国图书馆界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把刘国钧和杜定友联系在一起进行系统研究的并不多。即使是松见弘道本人,在他自己的论著中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北刘南杜”的提法。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刘国钧和杜定友二人的研究,他始终将此二人视为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者,在不少场合将他们相提并论,他甚至制作了一个表格将杜定友和刘国钧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笔者把它称作松见弘道的“北刘南杜”对照表(见表 1)。

表 1 松见弘道的“北刘南杜”对照表

姓名	生年	卒年月日	留学地	归国年	当时活动地区	当时工作单位	后来工作单位	分类法及发表年	要素说发表年	学位
杜定友	1897	1967. 3. 13	菲律宾大学	1921	上海	南洋大学	中山大学	世界图书分类法 1925	三要素 1932	文学士、教育学士、图书馆学士
刘国钧	1899	1980. 6. 27	威斯康星大学	1925	南京	金陵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图书分类法 1929	四要素 1934	哲学博士

这张表格出自《中国近代图书馆巨匠:刘国钧的肖像及其丰功伟绩》^[11],是 1980 年松见弘道在得知刘国钧去世的消息后,花了三年时间,

在儿玉孝乃和山内弘江二人的帮助下,写下的一篇纪念长文,不仅对刘国钧的生平和业绩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回顾,也对刘国钧和杜定友学

术和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对比。

松见弘道对于“北刘南杜”的研究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研读他们的著作,进而将其翻译为日文出版。1958年他将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略》翻译发表在《图书馆界》上;1963年、1980年他先后将刘国钧的《中国书史简编》及其修订版翻译出版;刘国钧的另一本著作《中国书的故事》,经他翻译后连载在1967—1978年的《东海地区大学图书馆协议会志》上,该书经过郑如斯修订后,在1983年再次翻译出版。值得指出的是,松见弘道并非机械地翻译,而是将原著中的错误也尽量加以改正,此举得到了刘国钧之子刘家祜的肯定和感谢^[12]。

其二,多次撰文介绍他们的学术业绩和人格,并致以较高的评价和敬意。根据他的《中国图书与图书馆》日文版一书中所附历年著述目录以及日本 CiNii 数据库检索统计,截止到1993年,他所发表的论文中,标题中包含刘国钧的有四篇,包含杜定友的有两篇,除了这些专门研究以外,还有多篇论文中提到了与二人相关的内容。

其三,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是置于世界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发展视野之中的,所以他才会史无前例地把他们与举世公认的世界一流图书馆学专家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图书馆杂志》曾经以《图书馆的奠基者》为标题,系统介绍世界知名的图书馆专家。松见弘道为该主题先后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介绍刘国钧和杜定友,使中国的“北刘南杜”与诺德(Gabriel Naude, 1600—1653)、布朗(James Duff Brown, 1862—1914)、卡特(Chales Ammi Cutter, 1873—1903)、阮冈纳赞(Shiyali Ramamrita Ranganathan, 1892—1972)等人的名字并列在了一起。可见,松见弘道的确具有了不起的胆识和眼光,不愧是“北刘南杜”研究的

专家。

其四,松见弘道在对他们的研究过程中,还与他们本人建立了密切的通信联系,并且互相寄赠彼此在研究中急需的专业书籍。他们的一些亲笔通信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开来,对于无缘面识老一代图书馆学家的后辈来说,无疑是一笔珍贵的财富,从其书信手迹中可以想见其为人、处事及品德,从书信的内容中亦可窥见当时中日图书馆学交流之一斑。

3 松见弘道与“北刘南杜”的书面交往

早在1940年夏,松见弘道就在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读过刘国钧编写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书中介绍的金陵大学及其图书馆,让他感受到了这所大学独特的气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949年以后,他不断从各种杂志上读到刘国钧发表的论文,后来又多次通信,越发被刘国钧高深的学识和高尚的人品所感动。1955年,在收到刘国钧赠送的新著《中国书的故事》之后,他尝试着翻译此书,并且反复向刘国钧请教。1955年12月,郭沫若率团访问日本,这是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之前一次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外交活动,在两国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就是在这次访问中,松见弘道委托郭沫若转交给刘国钧一封信,希望获得《中国书的故事》一书的翻译权^①,刘国钧为了促进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不仅回信同意了松见弘道的请求,还为日文版写了序言。1956年6月,松见弘道通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转交给刘国钧一封信,告知已经收到了刘国钧寄来的翻译许可和日文版序言,并且汇报了自己翻译的进展情况。刘国钧回信对松见弘道的刻苦勤奋大加赞赏,同时对中日两国文化交往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也充满了信心^[12]。经过多次通信,松见弘道对刘国钧的认识更加深入,开始撰文向日本图

① 松见弘道的有关论文都说是《中国书史简编》的翻译权,作者记忆大概有误,因为此时《中国书史简编》中文版尚未出版,其初版时间是1958年。

书馆界介绍刘国钧,这就是他在 1956 年 10 月写成的第一篇关于刘国钧的文章——《中国图书馆学、书志学泰斗刘国钧先生》^[13]。

在之后的几年里,松见弘道忙于本馆新馆舍的建设,加上因为出版社不景气等各种原因,已经翻译完的《中国书的故事》不能如期出版,而学界以及他的许多朋友却催促他尽早出版,使他左右为难,同时他又觉得愧对刘国钧,故而有几年时间没有通信。后来在国会图书馆整理部长弥吉光光的建议下,他又把刘国钧 1958 年出版的《中国书史简编》进行了翻译。1963 年 1 月,松见弘道写信给刘国钧,解释了《中国书的故事》日译本迟迟未出的原因,同时希望能获得《中国书史简编》一书的翻译权。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个人特殊的处境,刘国钧对此事非常慎重,他首先向北京大学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汇报,在得到王学珍教务长的同意批复后,才回信同意其翻译,并写了日文版序言^[14]。松见弘道和前述刘家祐的文章都提到了这封信,落款时间是 1963 年 3 月 10 日。1963 年 11 月,在收到松见弘道寄来的《中国书史简编》日译本后,刘国钧回信称赞日本的印刷技术,在 12 月 26 日的信中,提到自己从春天起因为高血压感到身体不适,五月份开始休养,不能讲课和研究,不过已逐渐好转。刘国钧在短短一个月内给松见弘道写了 3 封信,足见他对此事之重视。1964 年 12 月 25 日,刘国钧在获知日译本的销售情况后所写回信的影像被松见弘道刊登在相关纪念文章中,信笺上的古代仕女图愈发衬托出幽幽书香。

文革期间他们的通信不得不终止了。1979 年春,松见弘道终于实现了访问中国的夙愿,却因刘国钧动脉硬化需要绝对安静而未能见到,次年 6 月刘国钧去世,给松见弘道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相对于与刘国钧的书信交往,松见弘道与杜定友的书信交往见于记载的并不多,不知《杜定友文集》中有无记载,仅知松见弘道在 1958 年翻译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史略》之际,曾与

杜定友有过通信联系。

4 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介绍和评价

作为一个外国研究者,松见弘道对于刘国钧和杜定友的研究和关注是持续的,从他们从业开始到去世,跨越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他们的认识和评价是不间断的、完整的,也是难得的,值得学界重视。

4.1 关于刘国钧

《中国图书馆学、书志学泰斗刘国钧先生》一文写作时间最早,把刘国钧定位为新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指导者,以及图书馆学和书志学的泰斗,对于刘国钧在中国图书馆界的地位,他使用了“君临”这样的字眼来描述,这个词语的特定含义决定了其使用范围的有限性,迄今为止,笔者仅见他在描述刘国钧和杜定友在图书馆界的地位时使用了该词^[16],而在日本图书馆界,松见弘道也只在在对间宫不二雄的地位描述时使用了这个词语。

这篇文章因其写作年代的特殊性而具有难得的历史价值,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如此细腻的笔触描写一个中国图书馆学者的小传是非常少见的,对于后人了解刘国钧的生平和家庭都非常有意义,至少使读者了解到刘国钧先生在事业、学术和生活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堪称黄金发展期。1963 年出版的《中国书史简编》日文版的后记,也采用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可见尽管岁月流逝,经历了 1958 年大批判的刘国钧,其形象在松见弘道的眼中依然丝毫未损。

该文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概述解放后的中国图书馆界不同以往的新气象以及刘国钧的特殊地位,接着叙述自己与刘国钧的书面交往,然后是刘国钧小传,包括解放前后两部分内容,之后叙述《中国书的故事》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其中强调了刘国钧对于中日友好交往的积极乐观态度,最后介绍了刘国钧当时的家庭情况。

该文指出,刘国钧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时代的主要成就是作为《图书馆学季刊》的编辑主任发挥才干,同时还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如《四库分类法之研究》《目录论略》《中国现在之图书分类问题》等分类和目录方面的论文。1929年发表的《中国图书分类法》是运用从美国学来的近代图书馆的管理法、特别是图书分类的概念而提出的中国的图书分类法,直到1949年后仍被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南开大学、辅仁大学等公共和专业图书馆所采用,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分类法,与王云五、何日章等沿袭杜威十进分类法的那些分类法完全不同。同年发表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34年发表的《图书馆学要旨》对图书馆学提出了明确的见解。1949年后,刘国钧无论是作为理论家还是实践家,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就。他作为北京大学教授,从事着研究和教育活动,同时还到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参加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将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图书馆界吸收到的先进经验和理论运用于实践指导当中。1952年出版了《图书怎样分类》,该书不仅是指导图书分类方法的手册,还涉及图书分类理论,对研究者也不无益处,所以日本文部省图书馆职员养成所6期生佐佐木敏雄、菅原勲、菅野宏子三人正计划翻译此书。1954年发表了《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纸和印刷术的发明》,在日本也拥有大量的读者。195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的故事》,作者作为目录学者,以成熟的学识和爱国热情,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对象,讲述中国书的故事,对于日本研究和书的起源和发展,也具有参考价值。

得知刘国钧去世的消息后,松见弘道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纪念这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即1981年的《伟大的图书馆学者刘国钧先生——围绕相继去世的中国图书馆界要人展开》^[17]、1982年的《图书馆的奠基者 10: 刘国钧》^[18]、1987年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巨匠: 刘国钧的肖像及其丰功伟绩》^[11]。这些文章以更广阔的视

野,补充介绍刘国钧的早年经历和业绩,以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经历,对刘国钧在学术领域所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恰当的评价。虽然部分内容有重复,但他所收集的材料之丰富、倾注的感情之深沉,令人动容,刘国钧先生竟有这样一位异国知己!

为了说明刘国钧的伟大,松见弘道举了两个例子。其一是刘国钧先生去世半年内,他看到至少有三种杂志,包括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知识》、科学出版社的《图书情报工作》、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图书馆学通讯》,刊登了北京大学为刘国钧先生举办葬礼的消息。其二是在朱天俊、张琪玉写的评论中,把刘国钧称作奠定中国近代图书馆基础的重要人物。

松见弘道概括了刘国钧毕生的著述,指出刘国钧早在大学读书阶段,就在《世教新潮》上发表了《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一文。在去世之前,与病痛搏斗的同时,还在写《分类目录主题索引编成法》。刘国钧去世后,他的弟子整理发表了他的遗稿,如发表在《图书馆学通讯》上的《中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和《1965年以来美欧图书馆学论文简介》。刘国钧一生的著书、翻译、论文共有200多种,其研究不仅限于图书馆学,还涉猎哲学、宗教和文学。

松见弘道认为,对包括MARC在内的西方图书馆体系的引进是刘国钧最重要的贡献。他指出,刘国钧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情况下,仍孜孜以求于学术,密切关注外国图书馆界的动态,阅读、翻译不辍,率先介绍了MARC计划,并展望了其在国内的应用前景以及可能遇到的问题。他特意请朋友帮助,对刘国钧的这些成果进行非常详细的翻译和介绍。

松见弘道对于刘国钧的研究使我们认识到,在日本,关注刘国钧研究成果的并非只是个别人,而且对其成果的关注也不仅限于一两本书。松见弘道对刘国钧著作的翻译,不仅对他本人的教学研究有很大帮助,对日本文化也有重要的意义,正如野上俊静所说:“解读了中国书,也就弄明白了我国(日本)文化的发展。可

以说,中国书是中国文化和我国(日本)文化的一个共同的基础。”^[19]

4.2 关于杜定友

在缅怀刘国钧的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杜定友。在1981年发表的《伟大的图书馆学者刘国钧先生——围绕相继去世的中国图书馆界要人展开》一文中,他按照这些要人去世的时间,先后缅怀了杜定友、赵万里、黄元福和刘国钧。关于杜定友,他首先讲到的是在日本图书馆学史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的青年图书馆员联盟机关志《圖研究》,把它的地位比作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图书馆学季刊》,二者同样声名显赫,而命运同样短暂。从刊名中的“圖”字来讲述青年图书馆员联盟的发起人间宫不二雄与杜定友的友谊,显示出杜定友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国界。可惜就是这样一对挚友,时常向后辈们提到杜定友趣闻轶事的间宫不二雄,直到1970年去世之际都不知道,杜定友早在1967年就已经去世。

其实,此文并不是松见弘道对杜定友的初次介绍,早在1973年,松见弘道在《日中图书馆界之虹——围绕着间宫不二雄先生展开》^[20]一文中就提到了许多中国图书馆界名人,如沈祖荣、胡庆生、桂质柏、杜定友、王云五、张凤、马宗荣、孙毓修、姚名达、卢震京、刘国钧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一带而过,而关于杜定友的内容却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这篇文章带着浓厚的时代烙印,因为当时中国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信息往来非常困难,松见弘道还不知道杜定友已经去世的消息,很自然地就对当时身处海峡两岸的王云五和杜定友做了一番对比:王云五正执掌台湾的财政界,虽然缺乏消息,杜定友想必仍在坚守大陆图书馆界之重镇。松见弘道进一步说明自己推测的依据——因为自1966年开始的三年间,杜定友与北京大学的刘国钧教授、《中国十进分类法》的著者皮高品一起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批判,杜定友的地位由此可知。在这篇文章里,仅仅与杜定友有过通信联系的松见弘道,还回顾

了杜定友访日期间与间宫不二雄的交往,特意提到当时正值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现存《永乐大典》目录之际,杜定友负责调查日本所藏不同版本的情况,得到了间宫不二雄的大力支持,后者为此付出了艰苦努力,令杜定友难以忘怀。所以松见弘道希望通过间宫不二雄能够进一步与杜定友交往,可惜间宫不二雄已经去世了,令松见弘道非常遗憾。1979年松见弘道访华,得知杜定友已经去世,悲伤之情溢于言表,不仅专门以杜定友为题撰写文章,而且还在以间宫不二雄为题的文章中纪念杜定友。

在1982年发表的《图书馆的奠基者 11:杜定友》^[21]一文中,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松见弘道,以盖棺定论的方式来评价杜定友在中国图书馆史上的地位。该文分五个部分:沉痛的悼念,杜老与间宫老的友谊,杜老与“圖”字,忠贞不二的事业心,辉煌的成就。“杜老一生著译甚丰,据刘国钧先生透露,他一生仅著作就达700万言。另外,因为杜老还是《图书馆学季刊》编辑方面的权威,所以他可能也是活跃在《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领域的重要人物。”^[9]这段话虽然是对杜定友成就的描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松见弘道眼中“北刘南杜”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

1983年发表的《间宫不二雄先生与中国图书馆人》^[16]一文用了大量篇幅介绍杜定友的事迹,包括杜定友、刘国钧、皮高品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到的批判,《广东图书馆学刊》在杜定友去世13周年之际刊发纪念文章,包括杜定友的简历,杜定友在创办上海图书馆协会和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发挥的作用,《图书馆学季刊》的特色,杜定友在图书分类法方面的建树,杜定友访日与间宫不二雄友谊的结成,《圖研究》的创刊等内容。松见弘道还说,自从间宫不二雄与杜定友分别后,时常把对杜定友的思念挂在嘴边,如果杜定友在抗战中为保护图书所做的努力,以及在1941年的炮火硝烟中设立11月11日为“图书馆日”的建议能传到间宫不二雄的耳中的话,间宫不二雄一定会为杜定友叫

好的。

1984年,松见弘道发表了一篇长文《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开拓者——杜定友的人格及活动》,刊登在《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当年第4期上,惜未得见。

松见弘道对杜定友的研究始终体现了他对中日图书馆学发展共生关系的理解,他讲间宫不二雄必讲杜定友,讲《圀研究》必讲《图书馆学季刊》,反之亦然。从创始人到学术刊物,中日图书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标志竟然如此相似与关联,不能不让人得出“中日图书馆学密不可分”的结论。

5 结语

阅读松见弘道的文章堪称学习中日图书馆学交流史的一条捷径,因为他对于中日图书馆学两方面的文献都非常精通。从中方文献来

说,他一直珍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创办的《图书馆学季刊》,民国时期中国出版的一些重要的图书馆学著作及其他相关著作,比如《古今典籍聚散考》、《中国目录学史年表》等,他都专门研究过,他的许多见解和结论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检验。从日方文献来说更是如此,他对间宫不二雄创办的《圀研究》的高度评价,以及他所揭示的间宫不二雄在《圀研究》刊名中“圀”字的使用与杜定友的密切渊源,曾引导笔者一步步深入探明杜定友访日与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过程形成的始末^[22]。同样,松见弘道对于“北刘南杜”等中国图书馆学家的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自民国时期开始,中国图书馆学家的贡献就绝不仅限于把图书馆学从日美引进中国,他们还使外来的图书馆学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反过来又对国外的图书馆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们已有的认识,应当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図書館関係専門家事典[M]. 東京: 日外アソシエーツ, 1984: 257-258. (Nichigai Associates. The dictionary of librarians[M]. Tokyo: Nichigai Associates, 1984: 257-258.)
- [2] 松见弘道. 中国目录学私考[J]. 図書館界, 1953(4): 1-6. (Hiromichi Matsumi. Personal opinion on Chinese Bibliography[J]. The Library World, 1953(4): 1-6.)
- [3] 黄宗忠, 松见弘道. 中日两国图书馆学交流之花[J].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95(2): 8-9, 21. (Huang Zongzhong, Hiromichi Matsumi. The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95(2): 8-9, 21.)
- [4] 松见弘道. 中国图书与图书馆[M]. 黄宗忠, 姜振儒, 杨志清, 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Hiromichi Matsumi. The Chinese books and libraries[M]. Huang Zongzhong, Jiang Zhenru, Yang Zhiqing, trans.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95.)
- [5] 松见弘道. 日本高等学校图书馆概况[J]. 陈霖生, 译. 图书馆学通讯, 1957(3): 53-54. (Hiromichi Matsumi. Survey of the college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in Japan[J]. Chen Linsheng, trans. Bulletin of the China Society of Library Science, 1957(3): 53-54.)
- [6] 松见弘道. 评介台湾图书馆学、目录学论著索引[G]. 赵金兰, 节译// 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第2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2: 94-95. (Hiromichi Matsumi. Review of the index of Library Science and Bibliography in Taiwan[G]. Zhao Jinlan, trans. // The Edit Group of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Reference materi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2.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2: 94-95.)

- [7] 松见弘道. 樱花更灿烂 相映杜鹃红——拜受中国湖南大学图书馆张白影馆长撰并附主跋、郭吉冈手书之大匾额的欣喜[J]. 彭一中, 译.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95(1): 67-68. (Hiromichi Matsumi. Cherry blossom and azalea: glad to get the big horizontal inscribed board from the head librarian of Hunan University Library[J]. Peng Yizhong, trans.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95(1): 67-68.)
- [8] 松见弘道. 怀念图书馆学专家杜定友[G]. 王世斌, 译//书目文献出版社编辑组编. 图书馆学情报学参考资料第4辑.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4: 73-74, 38. (Hiromichi Matsumi. In memory of the library scholar Mr. Du Dingyou [G]. Wang Shibin, trans. // The Edit Group of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Reference materi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4. Beijing: Bibliography and Document Publishing House, 1984: 73-74, 38.)
- [9] 松见弘道. 中国现代图书馆学家——杜定友[J]. 魏振起, 译. 大庆师专学报, 1985(2): 59-60, 63. (Hiromichi Matsumi. Chinese modern library scholar: Mr. Du Dingyou[J]. Wei Zhenqi, trans. Journal of Daqing Normal College, 1985(2): 59-60, 63.)
- [10] 张白影. 东邻新寄语 初识如故人——记日本东海女子短期大学图书馆馆长松见弘道教授[J]. 高校图书馆工作, 1994(3): 54-55, 73. (Zhang Baiying. The head librarian of Tokai Women's Junior College: Mr. Hiromichi Matsumi[J]. Library Work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994(3): 54-55, 73.)
- [11] 児玉孝乃, 山内弘江, 松见弘道. 中国近代図書館界の巨匠: 劉国鈞の肖像——その多彩な業績をめぐって[J]. 東海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13, 1987: 135-161. (Takano Kodama, Hiroe Yamauchi, Hiromichi Matsumi. Liu Guo-Jun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libraries in China [J]. Tokai Gakuin University/Tokai Women's Junior College 13, 1987: 135-161.)
- [12] 刘家祜. 《中国书史简编》出版三十周年并日本版出版二十五周年记[J]. 河南图书馆学刊, 1988(3): 31-34, 37. (Liu Jiahu. 30 years'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shing of *The Brief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 and 25 years' anniversary of its Japanese translation[J]. The Library Journal of Henan, 1988(3): 31-34, 37.)
- [13] 刘国钧, 松见弘道. 书信[EB/OL]. [2014-12-07]. http://www.kongfz.cn/item_pic_11573767. (Liu Guojun, Hiromichi Matsumi. Letters[EB/OL]. [2014-12-07]. http://www.kongfz.cn/item_pic_11573767.)
- [14] 松見弘道. 中国の図書館学書誌学の泰斗劉国鈞先生のこと[J]. 東海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2, 1957: 3-5. (Hiromichi Matsumi. Mr. Liu Guojun, The leading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library science and bibliography in China[J]. Tokai-chiku Daigaku Toshokan Kyogikaishi (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 Tokai Area) 2, 1957: 3-5.)
- [15] 刘国钧, 松见弘道. 书信[EB/OL]. [2014-12-07]. http://www.kongfz.cn/item_pic_11573700. (Liu Guojun, Hiromichi Matsumi. Letters[EB/OL]. [2014-12-07]. http://www.kongfz.cn/item_pic_11573700.)
- [16] 松見弘道. 関宮不二雄大人与中国図書館人[J]. 短期大学図書館研究, 1983(4): 1-12. (Hiromichi Matsumi. Mr. Fujio Mamiya and Chinese librarians[J]. Journal of Junior College Library, 1983(4): 1-12.)
- [17] 松見弘道. 偉大なる図書館学者劉国鈞先生——あいつぐ中国図書館界要人の他界をめぐって[J]. 東海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26, 1981: 2-6. (Hiromichi Matsumi. The great library scholars: Mr. Liu Guojun and other departed important librarians[J]. Tokai-chiku Daigaku Toshokan Kyogikaishi (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 Tokai Area) 26, 1981: 2-6.)
- [18] 松見弘道. 図書館をつくった人々10劉国鈞[J]. 図書館雑誌, 1982, 76(3): 151-152. (Hiromichi Matsumi. The founders of the libraries 10 Mr. Liu Guojun[J]. The Library Journal, 1982, 76(3): 151-152.)

- [19] 劉国鈞,鄭如斯. 中国書物物語[M].松見弘道,译.東京:創林社,1983;序文. (Liu Guojun, Zheng Rusi. 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M].Hiromichi Matsumi, trans. Tokyo: Sorin Co Ltd,1983;Preface.)
- [20] 松見弘道. 日中図書館の虹;間宮不二雄大人をめぐって[J].東海地区大学図書館協議会誌18,1973;6-11. (Hiromichi Matsumi. The rainbow between libraries in Japan and China; on Mr. Fujio Mamiya[J].Tokai-chiku Daigaku Toshokan Kyogikaishi (Journal of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in Tokai Area) 18,1973; 6-11.)
- [21] 松見弘道. 図書館をつくった人々11杜定友[J].図書館雑誌. 1982,76(5):255-256. (Hiromichi Matsumi. The founders of the libraries 11 Mr. Du Dingyou[J].The Library Journal,1982,76(5):255-256.)
- [22] 范凡. 杜定友访日开启中日图书馆学双向交流的“園时代”[J].山东图书馆学刊,2014(4):35-40. (Fan Fan. The two-way communic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started by Mr. Ding U Doo's Japan trip[J].The Library Journal of Shandong, 2014(4):35-40.)

范 凡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通信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图书馆。邮编:100871。

(收稿日期:2014-12-19)